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耿云志
编

胡适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耿云志
编

胡适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胡适卷/耿云志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0-19391-5

I. ①中… II. ①耿…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胡适 (1891~1962)-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701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胡适卷

耿云志 编

Hu Sh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52.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35 000	定 价	1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胡适（1891—1962）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教务长，哲学、文学等系教授会主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抗战时期一度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先后参与创办或参与编辑、撰稿《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以及《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刊物。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社会活动领域，都曾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胡适又是现代中国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他生前已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死后“功罪盖棺犹未定”。在中国大陆更有持续数年对胡适的大批判，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他的名字只有在被批判、被诅咒的时候才会被提起。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几乎无人知道了。我从1975年起，系统研究胡适的著作及其档案资料，乃发现一个与大批判所塑造的完全不同的胡适。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少数几个学者摆脱成见，从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做起，逐步揭示出胡适的本来面目。如今单是在大陆，关于胡适的传记性著作就有数十种，专题研究论著亦复不少。海外研究胡适的著作，凡比较有价值的，都已翻译成中文出版。胡适本人的著作也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甚至《胡适全集》也出版了。

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急速变化的转型期。转型期的最大特点是旧的观念、旧的规范和旧的制度日渐衰朽，失去了人们的信仰；而新的观念、新的规范、新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人们不免彷徨、困惑。先进分子逐渐意识到，国家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政治上的改革与

革命运动，经济上种种开新的尝试，都渐渐兴起。与此同时，思想文化上的革新运动吸引了有识者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在一部分先觉者看来，要革新社会、革新国家，先要革新人的思想。因此，人的解放，具有更基本的意义。

变革人的观念，改变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势必牵动整个民族文化变动。所以这同时也就是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过程。

为了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观念、新学理，也需要总结既往的文化遗产。当新文化运动起来的时候，晚清以来的先觉者已经在上述两方面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如严复、梁启超等的西学介绍，如章太炎等的国故整理，都已有了不错的成绩。所以，新文化运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做西学介绍和批判旧传统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问题。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领袖之一的胡适，也才有可能较全面、较系统地提出一种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主张，这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标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胡适，可以说，他一生的活动都在贯彻他的上述主张。但我们必须懂得，文化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是大致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努力才能完成。“五四”一代的大师们，只是在若干主要领域做了开辟前路的工作。有些方面，道路被打通了；有些方面只是做了初步的清理工作；有些方面他们做了尝试，但至今仍无共识；有的可能还要争论很长时期。但不管怎么说，“五四”一代大师们为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遗产。

胡适思想形成、发展的主要历程

胡适从徽州一个中等家庭的普通孩子，成长为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其一生除了尚未形成自觉的使命感少年期，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准备期

胡适于1904年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还曾主编《竞业旬报》。这个时期似亦可划入准备期。但仔细分析上海时期的胡适，尽管比一般少年早熟，文字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却远没有开创自己人生道路、做一番

大事业的自觉意识。所谓准备，一定是有目标，有相当的自觉性的努力过程。所以，上海读书时期还不能算是胡适人生的准备期，而应从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赴美留学算起。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要做“国人之导师”，要在思想学问上准备条件，求得一种可以自立立人，可以济世医国的健全的思想方法。他看到当时中国所处的际遇环境，中国人面临最根本的课题，是尽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协调、相结合，使中国古老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获得新生命。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有一个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更新过程。他认定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个文化更新过程中充当一个开路的工人。在留学的最后两年，胡适竟找到了中国文化更新的切入点——以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的文学革命。这是他实验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实验园地，也是他为中国文化更新所做的奠基工程。

第二个阶段，开创期

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是1917年1月在国内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尽管这个尚未归国的留学生的文章，其口气相当谦逊、温和，但文学革命的中心议题——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已明白宣示出来。后来全国纷纷扬扬的讨论也正是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的。

胡适回国后，即与《新青年》的创办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成为亲密同事。以他们两人为核心，以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为基地，很快形成了包括许多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在内的一个以开创新文化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群。《新青年》即是他们发表言论的中心阵地。回国后的胡适为文学革命提出了新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继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了创作新文学、创作新诗的具有范式性意义的主张。因为顺应时代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文学革命迅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功。随之，一大批用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纷纷出世，连古文家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学园地——诗歌，也逐渐为白话诗让出了地盘。

一般人只知道，在文学革命中，胡适提倡白话文。其实，胡适的主张远不限于此。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纲领，把白话文学与国语统一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说“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只要读过书，大都能没有困难地

提笔作文，开口讲演，这是文学革命之赐。那么，今天，不论天涯海角，城市乡村，凡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都能没有困难地互相交谈，彼此沟通，这同样是文学革命之赐，同样是胡适大力倡导之功。我早就说过，白话国语的通行，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觉醒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著名的革命党领袖廖仲恺曾略带夸张地对胡适说：“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廖仲恺致胡适信》[1919年7月19日]，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401页）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是人的解放。这是走出中世纪、建立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议题。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的最大贡献亦在于此。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他最为坚持一贯而又用力最多的是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他在解释新文化运动宗旨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的发现”。在中国，自从孟子大骂杨朱、墨翟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及正统士大夫皆提倡敬天法祖，尊崇圣教，一概抹杀个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其尊重个人的精神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格格不入。于是守旧的士大夫也学孟子的口吻，斥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但既为洪水，也就只可疏导不可阻挡。胡适及时地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并第一个明确地解说了个性主义的真正意义。他指出，真的个人主义即是个性主义。个性主义的真谛，“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卷四第174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胡适认为，若否定个性，否定个人，社会就没有生机。但如果个人不能对自己的言论行为完全地负责任，那社会就将陷入混乱。胡适强调：“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6页），“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5页）。他把个人的解放，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确立紧密联系起来。在同时代人中，很少有人这样清楚地提出和界定个人主义，也很少有人这样明确地把个人的解放与建设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目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提倡个性主义，努力解放个人，是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化更新所作的最大贡献。

由于提倡个性主义，解放个人，于是自然地强化了清末以来女子解

放的运动；正是由于个性解放，使一大批青年男女冲破家庭四壁的限制，冲决旧伦理教条的网罗，走向社会，成为独立的个人，参与种种新事业，直至投身革命；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度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毕竟是个学者，除了启蒙思想家的角色，他还有意地“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大胆采用新方法，用新眼光重新审视旧典籍，创造中国学术的新典范。这一点，他通过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发表《〈红楼梦〉考证》等一系列重头文章而实现了。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早已是学界熟知的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家们，例如冯友兰，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同于胡适，可是他们都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著作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至于胡适的古小说考证文字，不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而且示范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范式。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启迪了一代青年学子。著名的古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是受了《〈水浒传〉考证》的启发而开始其疑古辨伪的工作的。后来到抗战时期，陈寅恪曾对人说，胡适之的小说考证文字，至今无人可比。其典范性不容置疑。

胡适在其一生事业的开创期主要做了三件事：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学术创新。这三件事对于现代中国都有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三个阶段，稳定期

1926年7月，胡适为中英庚款的事远赴欧洲，后又到美国，1927年5月才回国。这时，国内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适这个自由主义者既不为北方旧势力所容，也不为标榜“革命”的南方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他在上海过了一段较为清闲的日子，出版了《白话文学史》，写出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整理禅宗史料，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这是他自认为学术上很有收获的时期，然而在政治方面却经历了一段波折。

胡适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原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回国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甚少民主和革新的气象，却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种种专制的手段，胡适感到无法忍受。于是他在《新月》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主要有《人权与约法》，《新月》2卷2号；《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月》2卷4号；《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6~7号合刊等），激烈抨击国民党，批判他们反对新文化的反动倾向。这大大激怒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引起他们的围攻和打

压，持续了一年多才渐渐平息下来。最后胡适表示，他批评国民党本来并无恶意，“只是希望他们自身改善”。这可算是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段磨合期。

1930年11月，胡适举家迁回北平，重新回到他一直眷恋的北京大学。从1932年起，他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成为校长蒋梦麟的得力帮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同情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从此，他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臣”和“诤友”。通过他自己主持创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时评和讨论政治的文章。这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些胡适的学生，有的，如罗家伦等已在国民党政权中占一席之地；有的，如傅斯年、顾颉刚等都已成为有影响的学者。胡适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俨然成了朝野敬重的首席学者，知识界不争的领袖。胡适作为中基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全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和秘书，也大大加强了他在学术文化界的影响力。因为此会掌管着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补助中美学术文化交流，派遣留学生，交换学者，还可以补助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等。胡适在会中能得到中美双方董事的信任和尊重，最能协调会中各种不同意见，所以圈内人皆知，胡适是中基会的灵魂。

胡适这时领导着两项规划甚为宏大的学术工作：一是从20年代前期即已开始的“整理国故”；一是主持中基会属下的编译委员会，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西书。整理国故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重新发现其价值。在胡适看来，这是建设新文化必要的基础工程。至于翻译西书，其意义甚为明显。这两项工作，因国家的不安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胡适返北大后，尽管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但胡适本人的生活毕竟相对安定，所以在学术上仍取得不少成就。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的《说儒》。这篇五万字的长文，系统论述了儒的起源、儒者的社会角色和孔子对儒学的大贡献。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者有不同意见，但谁都无法否认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胡适继续写了多篇关涉古小说考证的文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醒世姻缘传〉考证》，这是胡适颇引为得意之作。

此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是不能不提到的。1929年，胡适为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1929）写了《文化的冲突》（胡适又自译作《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心意思是批评折衷主义地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指出那不过是变相的保守主义,主张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当时和今天差不多,留心阅读英文杂志的人甚少,所以此文未引起大的反响。到了1935年1月,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很典型的折衷主义的主张。当即有陈序经著文加以批评,明确主张“全盘西化”。这时胡适尚在南方。回北平后,他先在他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者后记》中声明:“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到了3月底,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批评十教授的主张“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同时正面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除了指出文化自身皆有惰性,因而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化不可能毁灭一种文化的根本基础之外,又提出,所谓文化本位,实际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位是不会被毁灭的。这是极其重要的见解。他还指出:在文化的大变动中,不可能有一种可靠的用以指导整个文化各方面选择去取的标准,只有让我们的老文化与世界的新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样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两个多月后,他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郑重声明,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他愿意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但“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仍是不圆满的,照样可有不同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说明,把胡适说成“全盘西化论”者显然是不恰当的。总起来看,胡适关于文化的选择不应主观设定标准,应在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动中,求得建设新文化的结果;关于文化本位存在于无数无数的人民之中,坚信这个文化本位是不会毁灭的等等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既表明他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也表明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自信心。

从1932年5月起,胡适在他一群朋友们的鼓动下创刊《独立评论》,谈论政治的兴趣再度浓厚起来。对于全民族首要的对日外交问题,胡适长时间持比较低调的立场,反对对日开战,主张谈判缓解局势,以待国际形势的根本好转。他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评。

胡适对于教育和思想界的倾向也时常发表评论,还一度集中地讨论民主与独裁的问题。这一讨论比过去历次思想界有关此一问题的讨论都

更为集中、更为深入，意见也更为明确。胡适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在这场讨论中，他发表相关文章有 17 篇之多。他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民主政治的路，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很有创见地提出了民主政治其实是“幼稚园的政治”。许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不懂民主政治。胡适所以提出此一见解，是有鉴于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人程度低，经济、教育落后，难以实行民主，只能实行专制。胡适说，民主政治其实正适合于程度低的人民练习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幼稚园的政治”。胡适这话固然有毛病，但绝非毫无道理。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主观设定一个标准，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行民主，不到那个程度就决不可行民主，而只能行专制。民主既然有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到繁、从粗到精的发展过程，那么，只要大多数人已觉悟到民主制度是可取的，就不妨开始向民主的路上走。起点不妨很低，制度不妨简单，但只要是朝向民主发展，那就不同于专制政治，就是在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也就是在实行民主政治。应该说，胡适的见解对于中国人具有特别的启蒙意义。因为如果不这样看问题的话，民主政治就高不可攀，就被推向遥远不可知的将来，中国人就只有永远甘受专制的份了。

第四个阶段，动荡期

胡适的《独立评论》因七七事变的爆发而终止。他随即应召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思考和踌躇，他终于从不主战的“低调俱乐部”中走出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为中国的抗战寻求援助。从此，胡适的生活进入动荡的时期。

胡适在美国主要从事演讲活动，宣传中国抗战决心，争取美国朝野的理解与支持。1938 年 7 月又去欧洲，先后到法国、英国、瑞士等国。是年 9 月奉命担任驻美大使，10 月初，匆匆赶到美国赴任。担任大使期间，自然免不了到处奔走，除来往于国务院、白宫、国会之外，还几乎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发表演说，会见政商各界领袖。虽无显著建树，但对促进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了解，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2 年 9 月，他卸任闲居纽约，不久就搞起考据来。最初一篇考证文章是《〈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举例》。随后因对所谓“戴震窃袭赵一清《水经注》案”发生怀疑，从此用力考证此案几 20 年不辍。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9 月，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